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中共政黨屬性的不變與變

德立克 ( Arif Dirlik ) 曾經指出，對中共而言，社會主義原本是作為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而存在，現在則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為政權來服務。<sup>1</sup>這種涵蓋目的論與工具論的說法，正可以點出本文的研究所得，也是第一個答案：即江澤民主政時期的中共政黨屬性，出現的是「主軸堅持，路線調整」兩項特色。

主軸堅持，就是「不變」。

江澤民最高權力的發軔點，來自於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社會動盪與政權危機，故在鄧小平的理念中，保持政權穩定是賦予江最高的政治責任。雖然，江執政的十三年來，中國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已經出現若干雛形，社會分層現象導致了社會變遷，政府政策的推展引發了不小的生產結構變化和收入分配惡化情況，黨政幹部的貪腐逐漸侵蝕著中共的權力合法性基礎，但這些都沒有改變中共在政治改革，精確地說在政治開放上有大幅的更張動作。反之，綜觀這十三年中共官方文件與江澤民的公開論述，「維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要求比比皆是、無處不見。其中的核心意涵，當然還是維繫中共政權領導地位於不墜，與此同時，亦要顧及共產黨傳統論述上也仍保有著工人階級先鋒隊與當下執政黨的詮釋，特別是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強調，著力頗深。至於具體的部署，則是以思想、組織、黨風三大領域為主。

鄧小平時代的理論產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江澤民不敢也不能拋卻的。因為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公有制為主、多種成分所有制為輔的各項鋪陳，其所涉及的時間背景與邏輯推演，都和鄧理論息息相關。「十五大」把鄧理論提升至意識形態核心，既是一種尊鄧擁鄧的表現，

---

<sup>1</sup> Arif Dirlik, "Revolutionary Hegemony and The Language of Revolution : Chinese Socialism Between Present and Future,"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New York : M.E.Sharpe, Inc. 1989), p.27.

更突顯出江澤民要藉由理論的一脈相承，保持其統禦地位的精密設計。至於「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社會建設遠景，也是依附在鄧小平「三步走」的戰略尺度上進行。可以這麼說，江澤民在主政十三年期間的黨建工作，歸納起來就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背景，在歷史唯物論、社會主義初階論的鋪陳下，再用漸進主義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積極推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條途徑，藉由仰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達到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建設小康社會的目的。

中共學者認為，「理論思維的成熟是一個黨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正確掌握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並全面正確積極地運用於實踐之中，是我們做好各項工作的根本條件和根本保證。」<sup>2</sup>質言之，理論本質的鞏固，是中共與江澤民念茲在茲的首要工作。即使鄧小平認為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在摸石頭的過程中，腳步與船體始終要站穩，從這個角度就不難明白中共堅持核心意識形態，特別是黨的領導地位與執政地位不能撼動的用心。

霍姆斯（Leslie Holmes）在歸納社會主義國家（主要以蘇聯為例）崩潰的原因時，舉出了十四個觀察點，分別是：一、尋求獨立情懷與民族主義的興起；二、缺乏妥協的文化；三、對政治領袖的期望過高而導致失望；四、對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五、拒絕趨近於目的論和巨型理論的意識形態；六、意識形態的真空；七、道德的混淆；（以下為後共國家初期的普遍現象）八、通盤式的變革；九、暫時性與過渡性安排；十、政治權力傳承；十一、不穩定；十二、民眾有廣泛的不安全感；十三、第一世界國家經濟低潮導致缺乏對社會主義陣營經援的時機；十四、政權合法性的問題。<sup>3</sup>

這十四個觀察點，對於目前還存在的中共而言不盡適用，因為他是以「已經崩潰的社會主義政權」為研究標的，但這個向度確有助於檢視中共「不變」的理由。特別是看到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與朋友國逐一凋零，甚至是一夕之間瓦解的震撼，讓中共不得不對這些意識形態戰友的崩解原因心生警惕。在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喪失政權的威權政黨，以及對歐洲社會主義民主黨在中國實施可能性進行深度評價後，反而激起中共更高程度鞏固政權的主觀判斷，以及更接近現

<sup>2</sup> 王維澄、李連仲著，*闊步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年 5 月），頁 337-338。

<sup>3</sup> Leslie Holmes, *Post-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p. 16-21.

實社會發展階段的客觀評價能力。

如果說，江澤民時期所堅持的不變的政黨屬性，與國際政治氣候和民主化浪潮背道而馳的話，從另一個角度看，至少中共扛下了社會主義大纛，作為少數碩果僅存的，可提供後社會、後共產主義發展研究下的特例，這或許是中共對於人類政治與歷史演進的特殊貢獻。

路線調整，則是在不偏離主軸下的「變」。

前曾提及，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集體並非對任何外部變化視而不見，如鐵板一塊，惟渠等所採取的任何革新出發點，是絕不能脫離黨的基本性質的。進一步說，江澤民推動變革的初衷，真正關鍵還是要打造一個持久的政治系統，且在打造過程中，不會導致黨、國家、和社會的不穩定狀態。

包括「以德治國」、「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三講」、「抵禦風險、拒腐防變」、「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等，是過去十三年，尤其集中在「十五大」與「十六大」之間密集提出的政治口號。從權力結構言，這是江澤民在鄧小平過世並取得絕對主導權後所行的路線產出動作，依中共與江的說法，這是針對施政弊病與外界反應而產生，但背後的隱意，相信沒有人會質疑這多是為了維繫中共的執政利益。「以德治國」著力解決官員腐敗、社會道德意識低落的現象，避免使得中共遭受民間責難，危害執政基礎。「依法治國」要求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三講」強調以講政治為核心，增強落實黨政策方針的自覺性、堅定性。「抵禦風險、拒腐防變」要維護政治、社會穩定，防止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帶來的和平演變，防止「國變色、黨變修」。「革命黨轉向執政黨」則是希望能維持或擴大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

「三個代表」又是更大的跨越。它挑戰了中共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驗條件，但卻被江澤民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質對待而巧妙化解。

「三個代表」最重要的意涵，在於可以讓附和中共或親近中共的黨政幹部與企業家，光明正大地進行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轉換動作，藉由錢與權的驅使動力，

換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共生的結構。這種政治菁英、經濟菁英和知識菁英所形成的共治同盟，因為胸前掛著特殊受益者的符號，在面臨廣大的相對被剝奪者與社會弱勢族群的異樣眼光時，必須以造成最低程度意識形態矛盾的成本，實行快速有效的結合，以期適應目前大陸社會階層快速分化的情況，並由這種結合，使所獲邊際效益極大化。當然，中共依舊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法，就是以「三個代表」作為「充分發揮黨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這一偉大歷史任務中的領導核心作用」，<sup>4</sup>說穿了，還是領導核心。

無論「變」或「不變」，中共力守執政權位的謹慎、緊張與警惕，都在其間顯現無疑。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論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改革開放之後在中共的身上得到了若干證實；而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發展階段的推論，也在中共的大戰略裡，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維進行了反省和部分程度的實踐。在「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之間的取捨上，中共的思想作為目前尚經得起考驗，關鍵在於：最為人詬病的「堅持共產黨領導」認知，能夠支撐多久？這個問題當然不易得致解答，或許毛澤東對於共產黨未來所提出的「美好」結局，可以作為一個弔詭的詮釋：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失。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sup>5</sup>

## 第二節 試評中國與中共的未來

「十六大」雖無法宣示「後江澤民時代」已經來臨，至少可說明「江澤民主政時期」已經大體完結；剩餘者，是江對於軍隊控制時間的長短，以及其歷史遺產如何定位。總結來說，就是對第四代領導人的影響力。然而究竟江的政治遺產，

<sup>4</sup> 余昌森主編，*六大後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7。

<sup>5</sup>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頁279。

將讓中國和中共走向何處？這是本文結論要提出的第二個答案。<sup>6</sup>

1991年12月25日，當前蘇聯國旗由克里姆林宮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十月革命前舊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國旗時，就標示著主導國際政治格局近半世紀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出現了疲乏、甚至崩解的現象，全世界僅剩中國、古巴、北韓、越南四個親馬列主義的國度。<sup>7</sup>這個現實的發展不禁令人莞爾。因為當冷戰初期西方學者蔑視社會主義的前景，且掀起一波「唱衰」蘇共的浪潮後，「意識形態終結理論」(End of Ideology Theory) 頓時成為主流。李帕特 (Arend Lijphart) 指出，六十年代形成的「意識形態終結理論」，係認為社會主義政黨的思想已經從純正的意識形態，轉變為較重實務且偏向中間色彩的黨綱，只不過，李氏認為這個理論名詞應該修正，改為「意識形態的式微」。<sup>8</sup>換言之，彼時西方學界要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去看待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雖不敢下一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終結的斷語，仍主觀認定、希望這個對抗性集團能夠走向自我修正、迎合西方價值的方向。殊不知這個修正過程走了四十年才出現峰迴路轉的結局，更令人詫異者，則是還有一、兩個挺立不墜，甚至繼續影響國際政治氛圍的馬列信徒還存在著(中國、北韓)。

中國大陸的轉變與發展，則是更令比較政治學界感到驚豔有趣的研究標的。特別是中共這麼一個擁有全世界最多成員的政黨，領導著全世界最多人數的國家，歷經八十年代兩次大規模社會動盪後，在維持政權穩定的前提要求下，進行了多次理論和政策路線的更迭，把重心放在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經濟上且卓有所成。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漸進改革的思維充斥其中，經濟先政治後的戰略鋪排，使得中國大陸出現了政治改革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的悖離現象；在其綜合國力已位居世界第六位，但是人均收入還處於開發中國家的低度水準時，「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的兩種爭辯躍然興起。其核心問題在於：在江澤民的施政藍圖與實際表現下，中國的政、經、社氛圍，究竟出現了何種結果，未來會走向穩定、

<sup>6</sup> 對於胡錦濤的評價及其施政預測，筆者以為，受限於事態發展仍有變數，尚不易進行探討。故本文僅能以江時期的政治遺產為背景討論。

<sup>7</sup> Herbert M. Levine, *Political Issues Debated: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王業立等譯，**最新政治學爭辯的議題**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頁165。

<sup>8</sup>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陳坤森譯，**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台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2月，頁138。

穩定中震盪、還是持續震盪，甚至趨近崩潰？在此筆者再節錄幾位學者觀點，以為比較。

持穩定論者，例如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龔育之就指稱，江主政的十三年，包括了第一階段的收局（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十四大」）、第二階段的全程（從南巡講話與「十四大」到 20 世紀末）、第三階段的開局（21 世紀開始），這是政治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各方面改革配套的十三年。雖然還存在著若干問題（國企改革、社會保障、三農問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反腐敗、社會治安等），但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亦不漠視缺點困難，就是久安之策。<sup>9</sup>「十六大」的小康社會建設指標，則是另一個讓中共黨人直言穩定的理由。亦即，在中共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的前提下，現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可以反映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客觀要求。而包括破除阻礙生產力的束縛、持續推動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科技與教育等具體方略，都必須在保持社會安定和政治穩定的條件下實現。<sup>10</sup>

蕭功秦則認為，中國至少在未來十年內不會發生重大政治動盪，他所持的理由是，經濟發展沖淡了社會對腐敗、兩極化、失業等結構矛盾的不滿；民眾對政府的訴求不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各個階層與地區的問題是分散的，不可能出現全國性的政治危機；以技術專家治國的政治中心，態度已明顯「中間化」，且高層政治內部理念反差不大，不會出現不可調和的政治分裂；知識份子的溫和化與非意識形態化，其與民眾結合成反體制的政治力量條件不存在；強勢權威主義對於危機的承受力，以及弱勢群體的不滿受到低度政治參與的制約，而不會立即表現出來，故政治穩定不會因為腐敗和兩極化而明顯反應。當然，中國會有「軟性危機」出現的可能，但不會出現體制崩潰的「硬危機」。<sup>11</sup>

康曉光、狄克生（Bruce J. Dickson）的論點，應可歸為穩定中震盪論者。

<sup>9</sup> 龔育之，「十三年，奮鬥歷程和基本經驗」，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6/20021128/876199.html>

<sup>10</sup> 李君如主編，*小康中國*（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4-10。

<sup>11</sup> 軟性危機係指，體制與秩序在形式上仍會存在，但整個社會卻處於實質上的無政府狀態，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土皇帝當道，成為退化的制度體系的生活方式組成部分。見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2002 年第 6 期），頁 86-87。

康曉光指出，近期內中國大陸保持「政治穩定」的希望很大，但「最壞」的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這是因為政治菁英壟斷了公共權力，嚴厲控制公共領域，且在新權威主義旗幟下，與經濟菁英、知識菁英結盟，這就是政治穩定的基礎。但也由於社會大眾處於全面被動狀態，矛盾相當尖銳，分散的集體行動此起彼落，雖然中共有能力應付局部的集體行動，但若出現深刻而全面的經濟或社會危機時，很可能觸發全面持續的動盪，如果這種形勢不能迅速控制，勢必嚴重影響政府穩定。至於不穩定的基本因素，包括了腐敗、不平等、嚴重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海峽衝突、領導人猝逝、宗教壓制等。<sup>12</sup>

狄克生認為，中國正面臨著體系穩定的威脅。但由於中共持續保持著統治獨佔性，卻有越來越多人相信隨著經濟現代化後政治轉型就無可避免，使得抗議者也逐漸採取理性作為。加上中共成功地避免了多元主義的出現，使得獨立異議者難以組織串聯成為社會利益團體，這些都讓中共在面對政治要求呼聲時，能夠在回應上付出極小化的代價。不過，這也意味著面臨國家社會的危機時，整個中國將缺乏一股強硬且自主的社會力量與中共對話，那麼祈求藉由和平手段來達到平穩過渡的希望，相對來講就會困難的多。<sup>13</sup>

沈大偉 ( David Shambaugh ) 章家敦 ( Goldon G. Chang ) 或可屬於看壞中國、認為中共未來將在持續震盪中運作的一類學者。

沈大偉表示，目前大陸社會對於中共和整個政治體系廣泛地給予譏諷評價，同時，壓迫工具的弱化與市場經濟的成長，更突顯出社會不穩定，尤其是對中共統治信條的異議遍布。其次，黨政官員的腐敗，暴露了法治體系的不健全，連帶顯現出缺乏權力制衡與商業行為透明度上的弊病。至於經濟成長給中共帶來的壓力，集中在醫療、公共安全、就業、教育、環境品質和晚年照顧方面。最嚴重的是，中共無法對國家的未來提出有說服力的願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已經逐漸稀釋，在此情形下江澤民所提的「三個代表」當然無法獲得有力的迴響。因此，如果中共政權面臨了危機衝突，它很可能繼續使用武力來維繫權力；倘非

<sup>12</sup> 康曉光，「未來 3-5 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 (2002 年第 3 期)，頁 14-15。

<sup>13</sup> Bruce J. Dickson, "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31-32.

如此，中共勢必要發展出一套與民眾、民間組織分享權力的治理機制，否則它保有政權的能力將岌岌可危。<sup>14</sup>

章家敦所撰寫「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在台灣曾引起一陣熱烈討論，他也是典型不看好中國未來發展，甚至做出中國（準確地說，應該是中共）「即將」崩潰的大膽預言。他認為，中共雖然嚴打異議份子，但異議份子會暫時後退且繼續固守陣線，這個中共的心腹大患難以消除。當然還有其他威脅，例如官僚貪污和一黨專政，就讓中共成為不受歡迎且脫離群眾的孤立團體。加上失業大軍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和經濟衰退跡象的勢不可免，在中共的解決方案都要先通過意識形態檢驗之際，潛伏的問題就會惡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中國的經濟和中共政權會同時崩潰。因此，章形容，今天的中國正向某個目標蹣跚前進，路只走了一半，對於未來並沒有共識；既遭受轉型尚未完成之苦，又無法享受現代化的許多福祉。自由化或許能幫助中國，但是改革的緩慢卻成為絆腳石，因此，前蘇聯解體突顯出改革速度太快的弊病，而中共對於改革的躊躇不前，一樣也犯了路線的錯誤。<sup>15</sup>

各種可能預測，顯現出學界對於中共和中國的未來莫衷一是、百家爭鳴。筆者的看法是，中國應該屬於類似金觀濤所言的「超穩定結構」，這個國家、民族應不至於有崩潰的可能，而且要讓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崩潰，除非有破天荒的災難危機，否則談何容易？但是，目前掌控這個國家的執政團體——中共，若稍有不慎，就未見得能如其載體的中國一般，能夠長久屹立。即如本文研究所得，中共建政的歷史事實與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可以看做是維繫其政權合法性的兩大支柱，但這兩根支柱都有盲點存在。首先，建政的歷史地位不容抹滅，但是執政的合法權力地位與革命建政功績不能劃上等號，當江澤民喊出要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時，表示中共已經有了這種認知，因為緬懷過去只是一種自我陶醉，世代繁衍的結果，看的是現在與未來。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成長作為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讓這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令人刮目相看，而此經濟行為是結合了國內與對外兩個領域共同發展，依賴來自內外的雙元力量。當然中共的政策抉擇與引導，扮

<sup>14</sup> David Shambaugh, "Will the Party Lose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2002

<sup>15</sup> Gol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章家敦, 中國即將崩潰, 侯思嘉、閻紀宇譯 (台北: 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3月), 頁13-18。



演著最關鍵的角色，惟此角色隨著布景陳舊、場地移位、裝扮脫落等因素，也可能產生褪色、淡出的結果。

江澤民的成就，是讓中國在過去十三年避免了人為的、大規模的政治社會危機，而在這個機制建構（也可視為修正）過程中，中共面對的是國家、社會與黨三方的正面與負面變化，如何適應這些變化甚至有效利用，在江澤民的決策產出系絡中，其實可以看出若干眉目。目前看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應該已經確立，但中共自認並未完善，此可從「十六屆三中全會」還在主談這個議題，並且強調要有持續完善的過程，可資引證。就是因為中共施政主力依舊擺在經濟領域，使得它在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各項議題上，還採取著太極拳式的「漸進主義」思維，可說是用轉移焦點的作法，讓民眾與外界都把注意力放在經濟事務上。

換言之，如果我們以西方民主概念進程，要求中共實施全面民主、代議民主、或黨內民主的話，它以基層民主試點、社會主義民主、強化人大制度，歸納起來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說法，一句話就涵蓋了其尚未進行大規模政治改革的藉口。事實上，中共自覺尚未到達政改階段，這是因為中共對於政改的方針目標還不明確，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目前對其寄望過深，反倒不切實際。可能著手的方向，或許會在基層或社區選舉（不致影響全局）、司法改革（對外表示中共「依法治國」的落實，以及築起公民權利最後屏障的表徵）、治理能力等面向。至於黨內民主時機尚未成熟，原因在於，如果將中國的政治改革與黨內民主聯繫起來，表面上容易，但實際上難度極高。由於改革理應出現在執政者控制較為困難的環節，而黨組織是中共控制最為嚴密的地方，很難想像民主或政治改革會從此處切入並獲致成果。此外，與第一、二代領導人比較，江澤民的權力相對而言是衰敗或弱化的，至於胡錦濤，其雖展現出關懷弱勢與開明作為，但這兩人依靠中共的基本架構和理念，還是趨近高度威權的。因此，中共在體制內已經沒有太多改革空間，只能朝向體制轉型而非體制內轉型。<sup>16</sup>基於此，筆者認為，中共推動經改的想法將繼續落實，而下決心推動政改的時機雖非在目前，但也將是遲早的事，而且規模應當不小。如果中共能在 2020 年前完成改革，那麼對其小康社會建設將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到時，中共的政黨基本屬性，或許又有劃時代的轉變。

<sup>16</sup> 王綽中，「劉軍寧：中共欲行黨內民主，難度高」，中國時報，民國 92 年 7 月 2 日。

